

精湛技艺 妙手回春

——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传承记

张力程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代宣德红釉梨式壶。你很难想象在修复前它已经碎裂成10余片,把手和底座都缺损严重。但其优美的器形,发色纯正的红釉,是典型的“宣红”,代表了宣德时期铜红釉烧制的极高艺术水准。为了使这件颇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瓷器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修复师们详细查阅了同类完整器的图文资料,确定了修复依据,绘制了图样,对经过清洗的残片通过细致的粘接、补配和打磨,恢复了器物的原有形状。这件红釉瓷器的釉色变化极为丰富,有的地方黑红,有的地方红色偏浅,同时又呈现了高温烧造导致的红釉流淌的态势,大大提高了作色的难度。修复师经过无数次釉色的调配,对釉色的流淌性进行了精心模仿,最终使这件宣德红釉梨式壶呈现出“浑然一体,补处莫分”的效果。

“差处不可容一毫”

一件残破的陶瓷要恢复如初,需经过清洗、粘接、补缺、打磨、上色等步骤。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技艺的传统,便是在对各类陶瓷器的特点熟习于心的基础上,力求将每一个步骤都进行到“差处不可容一毫”的极致地步,使补缺部分上色后达到和原器浑然一体的效果,达到所谓的“无迹可寻”。

瓷片的粘接和补缺处材料的打磨,必须做到指尖触之无丝毫滞涩的程度,才能确保上色这一关键步骤能顺利进行。正是在这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上,体现了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技艺最为突出的两个技术特点。

首先是笔绘与喷绘相结合的全面着色。以融入书画功底的笔绘技法,根据原器的釉彩走势精准接笔、灵活表现纹饰的动感,辅之喷笔绘制的浓淡和晕染来体现色彩变化的微妙节奏,同时提升上色的效率,如此取两种技法之所长,保证全色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忠实再现原器图案的意境和韵味。

其次是高超的古陶瓷釉色质感还原技术。在全面掌握不同釉色釉质特点的前提下,充分实验不同修复材料的物理与化学特性,选取最为适合的色料和媒介剂的组合,以点、染、描、绘等多种上色方式,使陶瓷的颜色和质感得到最为逼真的模拟和呈现。这样的核心技术确保了不同时期各个窑口的古陶瓷都能被修复到肉眼几乎看不出处理痕迹的展览效果。

一以贯之的师徒制

“古陶瓷修复技艺”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技艺,其发端可追溯到上世纪。上海当时是重要的艺术集散地,各式古玩店遍地开花。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技艺第一代传人饶鸿发是当时修复古董文玩的一位巧匠,尤其擅长修古陶瓷。他在修复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系统总结了古陶瓷修复技艺的全套手法、工序和材料,成为当时上

海滩古陶瓷修复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1958年,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工场,饶鸿发和当时其他几位古董修复行的顶尖高手一起被聘入馆,专职从事古陶瓷修复工作。上海博物馆也成为国内最早设立古陶瓷修复岗位的博物馆之一。

饶鸿发以精湛的技艺修复了大量国宝级文物。与此同时,他在馆内收徒授业,其技艺至今已传承四代。目前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团队共有4名成员,个个身怀绝技。第二代传人之一的胡渐宜早年在上海模具厂工作,主要从事模具喷色,进入上海博物馆后,利用原先的技术特长改良了笔绘修复的技法,开创了喷绘修复,提高了修复效率,也使修复后的视觉效果更为自然逼真。第三代传人之一的蒋道银师从胡渐宜,开创了“瓷配瓷”的修复技法,并就这项技艺撰写了专著《古陶瓷修复技艺》,为业内广泛推崇。他的弟子、第四代传人杨蕴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首次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古陶瓷的修复和复制中,并在2018年全国文物修复技能大赛“瓷器修复”项目中获得一等奖。另一位第四代传人卜卫民则研究东西方古陶瓷修复理念,尝试运用多种新型清洗材料和作色材料,其出色的技艺在2009年被认证为首批“上海市职工岗位绝技绝招”。如今这两位老师也分别带出了学生。

一以贯之的师徒制是精湛技艺完整传承的保障,而每一代修复师的钻研进取使得古陶瓷修复这株老树不断发出新枝。

“请进来,走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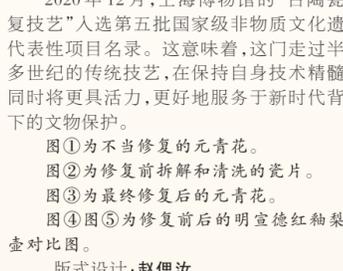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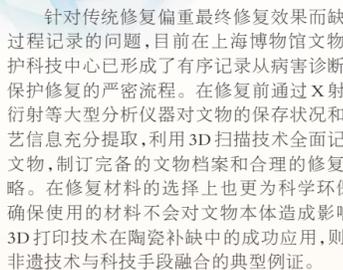
有异于过去古董行技艺的秘不示人,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团队始终秉持保护文物的公心和社会责任感,不仅在馆内以“师承制”模式传承,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馆外的古陶瓷修复人才。

早在1997年,蒋道银便受国家文物局邀请在扬州开设了古陶瓷修复技艺培训班,当时的学员如今都已成为古陶瓷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请进来,走出去”是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一直贯彻的培养模式,即一方面邀请其他文博机构的修复人员来上海博物馆实习培训,一方面派出团队前往技术力量薄弱和地处偏远地区的文博单位进行现场授课,形成提供长期技术支持的合作机制。近年来上海博物馆还与本地多家高校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合作,共同培养古陶瓷修复人才。

60余年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团队为本馆和国内各省市博物馆、考古机构、海外文博机构修复了数千件藏品,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如元青花双龙四系扁壶、成化素彩鸭薰等,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从石器时期的陶器到各朝各代不同窑口的瓷器,无论原先破损得有多严重,经过上海博物馆

修复师们的双手,都宛如“重生”,表面的釉彩以一种完整的姿态展现出来,在博物馆柔和的灯光中,向人们诉说着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修复理念的更新,上博的古陶瓷修复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在尊重文物原有历史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以更符合现代文物修复理念的最小干预、可逆性等原则进行保护修复。以一件馆藏元青花并纹套盒的修复为例,这件文物之前经过了不当修复,修复材料已经老化。通过对这件器物的拆解和清洗,去除了原有的修复材料,对整个套盒的上百片瓷片进行了预拼接,确保对器物的理解无误后再粘接成型。对缺损的部分用与该器物胎釉颜色接近的材料补配,精心打磨出套盒口沿的菱花瓣壶造型,使补配部分与原器物衔接自然。由于盖口缺损严重,缺乏补全青花图案的依据,特意选择以留白的方式,使观众和研究者能够看到原始的破碎状态和器物本来的风貌。



薪火相传

针对传统修复偏重最终修复效果而缺乏过程记录的问题,目前在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已形成了有序记录从病害诊断到保护修复的严密流程。在修复前通过X射线衍射等大型分析仪器对文物的保存状况和工艺信息充分提取,利用3D扫描技术全面记录文物,制订完备的文物档案和合理的修复策略。在修复材料的选择上也更为科学环保,确保使用的材料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影响。3D打印技术与陶瓷补缺中的成功应用,则是非遗技术与科技手段融合的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意味着,这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传统技艺,在保持自身技术精髓的同时将更具活力,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背景下的文物保护。

图①为不当修复的元青花。
图②为修复前拆解和清洗的瓷片。
图③为最终修复后的元青花。
图④图⑤为修复前后的明宣德红釉梨式壶对比图。

版式设计:赵偲汝

风雅青田石

本报记者 朱悦华 贾平凡



倪东方的石雕作品《花好月圆》。

波光里,高楼倒映,仿佛晶莹剔透的青田印河。在浙江省青田县,两年一度的青田石雕文化节,将隐藏在灵山秀水的美石故事层层打开。山川景物、人间百态,以巧夺天工之精妙,尽显青田一石。

厚重的文化底蕴是青田石雕枝繁叶茂的根脉。侏罗纪晚期,青田一带火山爆发,凝结成天然瑰宝青田石。青田石属叶蜡石,细腻润泽,以青色为基调,有红、黄、蓝、白、黑等,五彩斑斓,花纹奇特。有灿如灯辉的灯光冻,色如幽兰的兰花青,纯正清雅的封门青,黄色艳丽的黄金耀等,据青田石专家统计约有10大类108种。

封门青,产自青田县山口镇封门矿区,犹如春天萌发的嫩叶,微透如灯光冻,润泽细腻,质地极纯,故曰“清”,不坚不燥,篆刻印章,尽得笔意。封门青以清雅见长,隐逸淡泊,被称作“石中君子”。

从崧泽文化时期古拙简练的青田石璜、六

朝形态洗练的石雕握猪,至唐五代生动精细的圆雕宗教艺术,青田石雕与时俱进,以实用为主。南宋时期,青田石雕发展较快,以石章、笔筒、水盂等文人雅具及首饰、香炉、佛像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明中叶,篆刻家文彭偶遇青田灯光冻,操刀治印,风行印坛。文彭后,文人雅士自篆自刻,所取印材尽用青田灯光冻。清朝青田石雕从实用转向赏玩,器皿、仿古物、人物、动物等品类丰富,艺术趋成熟。清末民初,青田石雕销路大开。山里人家家家都会石雕。1915年,山口石雕艺人周芝山的梅鹤大屏、瓜盒、牡丹瓶等12件作品获美国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章。

青田石,中国印,中华文明长卷上一方精美的印章。

第八届青田石雕节上,型如古瓶、繁复精致的清代石雕珍品《四季平安》,格外引人注目。瓶盖巧用封门金玉冻俏色雕成孔雀、牡丹,两肩圆环上立鸚鵡,外层精刻四季花卉,3只和平鸽以承瓶身,整体作品富丽堂皇。这是青田籍华侨、深圳东方国石馆管爱军先生从比利时拍卖会上买回来的,他笑称自己是“捡漏”。《四季平安》代表着青田石雕高超的传统技艺。

青田石雕讲究“审石”,因材施艺,依色取俏,层次丰富,细腻精巧,大气奔放,形神兼备,自成流派。有圆雕、镂雕、浮雕、线刻等手法,分相石、开坯、粗雕、细雕、封蜡、润色等工序。青田石雕的雕刻技巧、风格塑造和情趣意境都达到了传统工艺精品相当高的程度。

1957年,青田石雕艺人张仕宽、林如奎、朱正普、吴如乾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张仕宽《葡萄山》开创“尖刀戳石”“坑洞密布”“暗刀明脉”新雕法,使葡萄叶脉

凸显,更加生动逼真。林如奎《高粱》开创农作物进入石雕新天地,几株红透坚实的高粱沉甸甸低垂着,淡绿叶子像轻盈飘带拥抱着累累果粒,籽粒青中泛黄,黄里透红,间有金黄小米、娇艳山花,散发着田野的芳香气息。自此,高粱、稻谷、小米、毛芋、南瓜、辣椒、扁豆、白菜、茄子等农作物登上大雅之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青田石雕百花齐放,诞生了周百琦《春》、倪东方《花好月圆》、张爱廷《丰收》等国宝级作品。倪东方的代表作《花好月圆》,薄薄一片灯光冻打磨一轮满月,纯洁到极致,两旁缀以花鸟,牡丹正艳,双鹤啾啾,枯藤老树底座。构图、造型、雕工、色彩,无一不令人拍案叫绝。

如今93岁的倪东方,声音洪亮,身体结实。他15岁随母学艺,以锯石工身份加入石刻合作社。白天锯石,晚上习艺。当他把雕好的烟花缸、和平鸽拿到厂里,众人皆惊。

金玉冻“睡美人”很好诠释了倪东方雕与不雕、大璞不雕的艺术哲学。这块金玉冻上有2.5厘米厚黄金耀,下面是5厘米厚封门青,上似黄金,下似白玉,纯净、细腻、温润。倪东方绕石数天,决定不雕,只用水砂纸打磨、抛光,上蜡后摆在陈列室,边上放了3个字“睡美人”。“睡美人”巧在不雕,薄薄轻纱,若隐若现美丽。

82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爱廷,须发皆白,笑脸圆润,像他刻刀下那些慈悲善目的老寿星。科班出身,带着无数的他,最喜欢童子题材创作。他说,孩童是世间最美的景色,是“柔软的力量”。发掘人性深处的纯真与善良,将至柔至软的美带给人们,是他的追求。

青田石雕,人才辈出。小镇山口是青田石雕艺术起源地,常住人口1万人,走出11位国

级工艺美术大师。现在的青田石雕艺人大多十几岁拜师学艺,后到高等院校深造。徐永丽是青田石雕界省级大师中唯一的女性。1966年出生的她,端庄优雅,很难相信这是一位整天与石头粉尘打交道石雕女匠人。难怪师傅张爱廷疼惜她,“女孩子搞石雕太不容易了。拉来一车石头,爬上车,拿不动,眼睁睁看着好石头被别人买走。”

火车站旁,是马兵、徐永丽夫妇的点石艺坊。30年前,北京小伙马兵第一次遇到青田石雕就被迷住了,魂牵梦萦,最终他留在了青田。宽大的展厅陈列着老人、妇女、儿童系列等几百件作品。徐永丽作品以人物神韵见长,《何处是绿洲》通体土黄色,造型饱满,石头表面原有纹理稍加修饰,恰到好处表现出风吹头巾的动感与思绪;《春的气息》简约现代,舍弃传统的繁复雕,只有长发纷垂的少女,双眼微合,风中沉浸。马兵追求意境理趣,《知鱼之乐》将远古哲学思辨场景凝于石上,两位智者嘴角上扬,眼神狡黠;《梅妻鹤子》《钟馗嫁妹》《竹林七贤》,圆雕、半圆雕、浅浮雕、高浮雕、镂雕相结合,虚实相间,意境悠远,粗犷大气。

走进陈小甫石艺馆,他与意大利雕刻家奇罗交谈正欢。身后是持青龙偃月刀、骑红马的红脸关公,长长披肩、美髯飘逸、马蹄飞腾,千里雄风,气势恢宏。茄子、杨梅、灵芝、紫山药、地瓜栩栩如生,说明牌上写着:“从小生活在山区,农作物不高产,唯有地瓜最丰富,是填饱肚子的大功臣。”陈小甫把对土地的深情与敬畏刻进了小小心地里。

“风雅之道,突然可观。”一生精粹镌刻于方寸之间,大江大河奔腾于股掌之上。以自然之道承接文化使命,是青田艺术家的文化自觉。从铁皮桶里放上茶叶、茶叶中间放上石雕,跨出国门闯天下,到“世界玉石,青田成器”完整产业链;从“外交使者”《花瓶》《小象》《群马》,上海世博会192个肖像组章、APEC峰会21方青田篆刻到武汉抗疫天使之痕……世界友好、国家大事都被艺术家巧妙雕刻成璀璨之作,汇入青田石历史长河。

考古札记

进入21世纪,古道驿路考察引人注目,先后有蜀道、川黔盐道、茶马古道、秦直道、唐诗之路、唐蕃古道、岭南古驿道的考察。但若要我推荐其中最著名的,则非“蜀道”莫属。

蜀道,即由秦入蜀之主干道。起点在今天的西安,终点在成都。它以汉中为关键节点,往北主要有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陇蜀道;向南主要有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荔枝道四条。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吟诵至今。秦岭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000多米,所以东汉时就有“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云两角,去天一握”之说。再加上其他的大山,蜀道之难首先在居高不可攀。

蜀道有很多传奇。其一是金牛道。古文献记载,秦王以计诱骗秦蜀王以五个壮士开山修路,道路修通,蜀王得到能变金的石牛,但秦国大军也乘机畅通无阻打进成都。真实存在的金牛道就是这个传奇的考证。其二是找道的铺设。《战国策》记载,战国中期,蜀道上找道已是绵延数里。考古发现的多处找道证实了这些记载。其三是大家熟知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楚汉相争时,刘邦被封迁汉中,张良建议刘邦火烧栈道,向项羽表示无意北返的心迹,以此麻痹项军。接着韩信又用修复找道的计谋骗过项羽,得以悄悄绕道攻入关中,在楚汉之争中拔得头筹。其四是蜀道上曾有火烧水激法开凿出来的、世界最早的人工隧道——石门隧道,长约16米、高宽约3—4米。三国时期诸葛亮经由蜀道数次北伐的故事也因《三国演义》而家喻户晓。

事实上,作为一条连接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蜀道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蜀”第一次见于记载就是在周原甲骨上。成都平原的大量考古发现也证实西周后巴蜀和中原联系更为紧密。

秦利用蜀道吞并了巴蜀,进而有了人口、粮仓和对东方六国尤其是楚国的地理优势,是秦能一统天下的重要基础。

唐以后,在北方盛行的佛教石窟艺术主要是经蜀道传入四川,在巴蜀大地蜀道沿线上散枝开花,结出了中国唐宋佛教石窟艺术最鲜艳的果实。

通过无数次实际行走的考古调查,蜀道有了更多的发现:在金牛道上的梓潼县发现了西汉汉郡郡治所在,在广元发掘了秦汉墓葬群和唐宋古窑遗址。在米仓道上找到了罕见的石栈遗迹,唐代的郑子信修阁道题记、宋代修筑栈道题记。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抗蒙古城小宁城以及数量众多的古桥、古栈道遗迹。大量的明清修桥修路石碑。在荔枝道沿线发现多处多龛唐宋石窟,其中有数龛正是唐开元、天宝年间开凿的,令人遐思。这些考古新发现年代跨度大,许多是与道路本体相关的重要实证,为蜀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我们通过行走,可初步确认蜀道道路走向变化不大。这是因山脉河流走向所限定。蜀道本体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南北朝以前,是以泥道和木栈道为主,所以刘邦能火烧栈道八百里;第二次大约是唐宋时期,许多地方木栈道改为石栈,大约也就是李白的《蜀道难》中所讲到的“天梯石栈相钩连”中的“石栈”;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在许多地段都铺成了石板路。因清初移民填川实施后,四川经济人口大增,经济繁荣起来,沿线人们有改善交通条件的迫切愿望。作为官道的金牛道本已修得很宽敞,许多地方也早铺上石板路了,但作为民间道路的米仓道、荔枝道的石板路,多为民间集资或乡绅捐建,故道路桥梁铺设好后,或立石碑,或在石壁勒名记事。

传统意义上的蜀道已经成为线性文化遗产。蜀道的保护利用不是建一个大博物馆或全路段开发那么容易,它的保护展示,需要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元呈现。既可以是让你记住乡愁的某个祠堂、土地庙的修复,也可以是捐钱修路碑群的成片保护。既可以是穿越诸葛亮北伐路线的复杂体验,也可以是中小学生在周末或者假期肩挑背扛的找道行走。既可以规划唐宋石窟艺术的研究之旅,也可以接纳成熟的团队旅游……

保护利用好这条古道,就是续写蜀道传奇。



图为蜀道上的石门栈道。

文化遗产